

还原与追溯

若干抗战史问题研究

主编

孔令闻 孙国英 吴承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还在争论的抗战史

若干问题研究

主编 孔令闻 孙国英 吴永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针对抗日战争史中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如：中日战争的性质、中国与美英的关系、中苏关系、国共两党关系等，分14个专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澄清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大专院校中国革命史的教学中，常常成为热门话题或“难点”。本书对提高中国革命史的教学质量和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也可为广大知识分子青年提高抗战史知识水平的读物。

还在争论的抗战史若干问题研究

HAIZAI ZHENGGLUEN DE KANGZHANSHI RUOGAN
WENTI YIANJU

主编 孔令闻 孙国英 吴承昆

责任编辑 白文林

封面设计 仁 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印刷厂印装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 1/32 印张：8 字数：185千字

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000册

ISBN 7-81012-118-9/D·003 定价：2.95 元

前　　言

根据这本小册子的实际内容，我们为她取名为《还在争论的抗战史若干问题研究》。

近几年来，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在与大学生们的交往中，经常遇到争议尖锐的抗日战争史中的一些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一些日本、英、美特别是台湾、香港等地史学界或政界人士关于抗日战争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著作和论述，通过种种渠道传播开来。他们各自的立场不同，观点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对许多重要问题的论点和评价，自然也就各不相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许多同学在学习中国革命史中，读了或听了这些东西，经过他们的思考和过滤，向教学第一线的同志们提了出来，形成了教学中的“热门话题”或难点。这也是许多朋友颇感兴趣而又一下子不易说清楚的问题。我们经过汇集、整理、筛选，对其中的十四个问题进行了研究，阐明了我们的观点，在教学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公开出版，献给更多的朋友参考。

我们热诚希望关心抗日战争史的朋友们给予指正。

参加本书撰稿的有：孔令闻、孙国英、李志英、吴承昆、胡晓光、姚晓玲、党磊、彭付芝、潘天元等。

编　者

一九八九年一月于北航

目 录

前言

一、硬把“七七”芦沟桥事变说成是日本所进行的一场“自卫”战争，是对历史的伪造……………1-27

- (一) 历史伪造者在向我们挑战
- (二) 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侵略者的既定国策
- (三) “七七”事变是日本侵略者“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

附录 1 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板垣征四郎）

附录 2 停战协定（塘沽协定）

附录 3 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察哈尔协定）

附录 4 关东军关于对蒙对华战略的意见书

附录 5 派兵华北的声明

二、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编造“虚构”说，只能是欲盖弥彰……………28-38

- (一) 一股值得注意的逆流
- (二) 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史实
- (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三、日本侵略军在对解放区“扫荡”中实行“三光政策”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39-47

- (一) 应当引起我们警觉的一些现象
- (二) 日本侵略军在“扫荡”中确实实行了“三光政策”

(三) 当年日本侵略军军人的证词

(四) 外国人的观察和记录

四、美丽的词藻掩盖不住严酷的事实——剖析日本侵略者所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 48-67

(一) 中国在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牢笼内能够走向繁荣吗?

(二) 从“大亚洲主义”到“大东亚共荣圈”

(三) 如此“共存”、“共荣”

(四) 祖国的富强只能靠中华民族自己创建

附录 1 大东亚建设的构想(东条在第79次帝国议会上的演说)

附录 2 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

五、国共两党为什么能实现第二次合作 68-88

(一)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双方的需要,何“上当”之有?

(二) 国民党主动沟通关系

(三) 两党实行政策让步,在合作中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四) 和平统一,共建中华

附录 1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附录 2 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

附录 3 宋庆龄: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

六、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 89-104

(一) 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在各个阶段的表现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变化?

(二) 应根据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对国民党军队的不同表现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附录：表（一）；表（二）；表（三）；表（四）

七、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中，为什么屡次发生摩擦事件？

..... 105-129

- (一)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关系是比较好的
- (二) 抗战中期，国共两党关系发生了变化
- (三)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分裂

附录 1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

附录 2 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

八、千古奇冤——皖南事变的性质 130-147

- (一) 对“皖南事变”性质认识上的分歧
- (二) 新四军在敌后的胜利发展，为蒋介石所不容。
- (三) “皖南事变”是妄图消灭人民抗日力量一大阴谋事件
- (四) 如何评价项英的错误

附录 1 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

附录 2 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

附录 3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

九、在抗战过程中，各民主党派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48-161

- (一) 经过抗日战争，我国大多数民主党派为什么与共产党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
- (二) 国民党与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的关系。
- (三)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处理同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的关系的？
- (四) 历史的必然之路

十、远东“慕尼黑”阴谋活动是否存在？ 162-178

- (一) 远东“慕尼黑”阴谋活动是虚构的还是客观事实?
- (二) 日美妥协牺牲中国的典型文件
- (三) 远东“慕尼黑”阴谋活动的深化
- (四) 远东“慕尼黑”阴谋活动的破产
- (五) 再说几句话

附录：日美谅解方案

十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的复杂变化

.....179-195

- (一)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 (二) 美国积极援蒋抗日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之间的反差
- (三) 从“亲共”到扶蒋
- (四) 结论

附录：蒋介石与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的谈话记录

十二、应实事求是地评价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的对华政策

.....196-211

- (一) 评价不一的苏联援助问题
- (二) 抗战初期，苏联给予了中国大量的援助和支持
- (三) 抗战前期苏联援华政策的出发点
- (四) 抗战后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化
- (五) “孵化共产党”之说，纯系不实和污辱之词

附录 1 日本国和苏维埃联盟间的中立条约

附录 2 雅尔塔协定

十三、迫使日本侵略者投降诸因素的评价.....212-222

十四、汪精卫投敌叛国给后人留下的思考.....223-242

- (一) 是爱国还是卖国?

(二) 汪精卫为什么会从一个革命志士走向叛国投敌?

(三) 启示

附录 1 艳电

附录 2 汪逆卖国协定全文

一、硬把“七七”芦沟桥事变说成是日本所进行的一场“自卫”战争，是对历史的伪造

（一）历史伪造者在向我们挑战

震惊世界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同时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苦。然而，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为欺骗日本人民和世界舆论，曾编造了种种“理由”，为其侵略的罪行辩护。本来，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这些所谓的“理由”早被历史事实所揭穿。令人遗憾的是，在战后的数十年间，一些当时的军国主义分子和站在军国主义侵略者立场上的所谓学者，又是写文章，又是著书，继续重复乃至编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开脱罪责的“理论”，以迷惑视听。以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为例，就曾多次引起风波，他们总想赖账，涂改历史，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史实。致使在不了解历史真相的青年人中，造成了思想混乱。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七·七事变”是怎样爆发的？它的性质是什么？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百般推卸罪责，矢口否认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是侵略，说什么芦沟桥事变是一个偶然事件，其责任不是他们的

罪过，而是中国军队挑起的。在当时日本四相会议的正式文件中就曾这样写道：“此事件的原因在于中国军队的不法行为。”^① 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家内，在自己的防地上，犯了日本的什么“法”？而日本的军队强行在中国的国土上，在中国军队的防地内，搞什么军事演习，并强行要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县城内去搜人，难道是合法的？

时至八十年代，历史被他们编造得更离奇了。日本的田中正明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其中在讲到“芦沟桥事变的肇事者”时说：“总之，刘少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派遣抗日救国学生，乘黑夜在芦沟桥上频繁向日中两国军队射击，挑动日本驻军和宋哲元的第29军发生冲突，致使冲突扩大为中日战争这一闻名历史的大战”。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发端于芦沟桥事件的日中战争（中国事变），既不是日军挑起的，又不是日本侵略导致的。对日本来说，这场战争毋宁说是被人强加于头上，为了自卫而进行的战争”。进而该书作者提出质问：“难道能说这是‘日本的预谋者们共同策划、准备、进行的侵略战争’？难道能象教科书那样，说这是‘日本侵略中国，?’”^② 该书到1984年9月，竟发行了第五版。由此也可看出其影响之广泛。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发动的这场大规模的历时八年之久的侵略战争，到了田中正明等人的笔下，却变成了一场被迫的“自卫”战争。田中正明所编造的理由，代表了一股反动思潮。这种思潮，在日本还有一定的市场。教科书问题的争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历史的史实是客观存在的，也是铁面无私的，妄图伪造历史史实的人，是必然要受到历史的谴责的。

(二) 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侵略者的既定国策

回溯近代中日关系史，从日本历届内阁的对华政策不难看出日本帝国的基本国策。明治维新使日本从封建社会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行列。作为后起的资本帝国，无论从资源还是技术力量方面，都无法与欧美相竞争。这就决定了日本要保证资本主义得以发展，主要手段就是要靠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夺取和侵占海外殖民地，靠战争繁荣经济。因此“开拓万里波涛，佈国威于四方”就成为明治维新的开国方略。

日本的近邻是中国和朝鲜，尤其是地大物博，时处封建统治和闭关自守的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历史进程上落后与先进的强烈对比，使日本帝国主义早将侵略的目光盯在了这块古老肥沃的土地上。侵略中国，独霸亚洲，征服世界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

大陆政策是日本黩武扩张政策的标志。

当日本自身尚未摆脱不平等条约之前就开始了对邻国的侵犯。明治维新第二年西乡隆盛等就提出《征韩论》，1910年终于吞并了朝鲜。1874年开始了对中国领土台湾的进犯，1879年吞并琉球，变中国保护国为日本版图。九十年代伊藤博文内阁进一步策划对中国的侵略。1894年的甲午之战占领了台湾和澎湖，之后与其他帝国主义一起参与瓜分中国的罪行。在绞杀义和团运动中日本派出的兵力最多，这标明其大陆政策开始逐步趋于形成。

战争加速了日本从资本主义向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二十世纪初开始了武力争夺和独霸中国的阶段。1905年日俄之战，朴茨茅斯和约的签订，从俄国手中夺去了旅大，控制

了南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夺去德国在中国的特权。乃至1915年大隈内阁关于妄图全盘控制中国的“廿一条”的提出，其大陆政策已臻完成。

随着内外形势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为防止欧美垄断中国，而在侵华的策略方式上适应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换。1916年寺内正毅组阁，随即修改了对华政策，由以“廿一条”等强硬手段为特征转变为以“西原借款”为中心。这个政策的根本原则是以中日“经济提携”来确保日本的“自给自足圈”。寺内首相在其《意见书》中特别强调建立以中日两国“经济合一”为前提的“亲善关系”。这期间段祺瑞从日本得到巨额贷款，总数达五万万日元以上。这些贷款都附加以各种政治条件。当时寺内首相就曾自夸说：日本从这种巨额投资中所得到的利益“何止十倍于廿一条”。这是假“亲善”之名，以行侵略之实。可见，方式上的任何改变，都掩盖不了其侵略中国的实质。“西原借款”政策后来终于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所高唱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理论基础。

1918年9月原敬内阁上台，表面上标榜不干涉他国内政，而实际却在插手中国内政，拉一派、打一派，扶植皖系军阀，助长中国内战。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下，确保日本在华的特殊权益。1921年原敬内阁所制订之《对满蒙政策》、《对张作霖之态度》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后来的清浦、加藤、直到若槻内阁的币原外交，都是这一基本方针下的必然产物。也都是其大陆政策的重要部分。

二十年代后期，随着日本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世界经济危机的加剧。日本进一步确定了吞并满蒙，灭亡中国的方

针。1927年夏，田中内阁在“东方会议”上炮制了一个《对华政策纲要》，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日本负有特殊的责任”。^③为发动武装侵略中国而制造欺骗日本人民的舆论。他在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中开宗明义“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确定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田中奏折》。现在有人以田中在该文中并无“奏折”字样为由，从而否定这个侵华战略的存在，一时众说纷纭。现在已经证实，“奏折”的名字是后人所取，但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事实。如当时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就说过：“田中奏折之真伪曾有弁论，然其披露后发生之事，与该奏折所载之次第计划若合符节。故不能不以该奏章为日本对华真正之具体表现也”。^④就连日本的重光葵也有类似评语。综合日本各方评论，都认为《奏折》虽非出自田中本人，但“东方会议”上的决议——《对华政策纲要》的内容确与《奏折》雷同。

“九·一八”事变是落实《奏折》的重要步骤。

按照侵略者的逻辑，满蒙对日本帝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被视为日本的“国防第一线”、“经济的生命线”。1931年3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给陆军步兵学校做关于《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中说“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由于帝国掌握着满蒙战略关键的据点，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声称“满蒙的资源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须的所有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必须对控制满蒙资源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准备”。并认为“如单纯使用和平外交手段，归

根结底不能解决满蒙问题”。^⑤由此可见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意图已暴露无疑。

从当时的一系列纲领、政策计划看其侵略野心也跃然于纸上。1931年日军部秘密制订了《1931年度形势判断》《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等，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并明确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同时关东军也进行了一系列阴谋策划，对发动侵略和侵占后的行政统治事宜都做了安排。

在行动上也做了多方面武装入侵的准备：扩充军备；调兵遣将；制造事端；军事演习等。仅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在沈阳等地军事演习就达50多次。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临巡视。就连挑起事端的爆炸柳条沟之计划，都是早已部署好的。1931年11月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就透露过此计划原订9月28日行动，后因计划败露而提前到“九·一八”。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其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它标志着大陆政策的更加完整化。

（三）“七·七”事变是日本侵略者“大陆政策”

的必然产物

“九·一八”事变得逞后，日本军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内地深入。当时一些日军将领就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要逐步在中国建立第二、第三个“满洲国”。事实上，在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所做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和《满蒙统治方案》中，都已把热河和内蒙置于伪满领域内。关东军所绘军用地图竟将华北地区列入伪满的版图。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毫不掩饰其侵略华北的企图。他在同美国记者彭海莱的谈话

中有这样一段：“日本如果不能控制平津地区，占有重要的平绥铁路，并支配北平西北及察绥两省四百多公里面积的铁矿地区，则将无法安心。而且，除非日本控制了黄河以南的全部中国领土，平津地区就不能安全。”^⑥足见其野心之大。1935年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情报中说：“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不能与帝国之生产率之增进相协调。”又说：“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之解决，实不能不注视易于进攻的中国北部。……华北诚为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其入侵华北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在行动上，继占领东北之后又不断向华北入侵。1933年占领山海关、热河，中国政府被迫签订塘沽、何梅、秦土等一系列协定，使我国河北、察哈尔、绥远等省大部主权被葬送。1935年底日本进一步制造“华北事变”，妄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随后，1936年1月日本政府制订《处理华北纲要》，正式把分离华北作为国策。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一项题为《国策基准》的文件，内称：“帝国当前应该确定的基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⑦这就是后来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早期计划。同一天召开的四相会议上又提出：“为实现这一方针，重点在于首先使华北迅速建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⑧为此，广田内阁又制订了吞并华北的主要策略，即在华北培植汉奸势力，使华北脱离中国政府的统治，在‘自治’的名义下建立傀儡政府，并逐步置之于日本权力之下，为其继续南下扩张打好基础。这也就是日本的“以华制华”政策。

‘华北事变’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了侵占中国的步伐。从

‘蚕食’转向了‘鲸吞’。值此之际，中国大地上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反对不抵抗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响彻神州大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中国趋向和平统一。日本的‘华北自治’与经济掠夺也处处受阻。同时，伴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英、美等国的消极旁观态度也有所改变，使日本在华北不能以和平手段达到特殊化之目的。于是，图穷匕首现，日本撕下了“亲善”的假面具，悍然以赤裸裸的军事进攻相威胁，积极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聚集着一大批中国通的近卫文麿内阁于1937年6月粉墨登场后，第一件事就是决定接受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为发动对华战争向陆军部提出的《上书》（1937年6月9日），该《上书》主张“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之形势”，认为：“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之威胁，此为最上策。”^⑨

事实上，扩大侵略的军事部署早在“华北事变”后就已开始进行了。

首先，在华北增兵。日本借《辛丑条约》为名，在华北派有驻屯军。本来条约规定，各国驻军数额、任务、驻地均有限制，而日本却一再借口中国发生变故，为保护其居留民之“安全”而要求增兵。华北事变后，又未经中国同意擅自多次增兵，终至扩大为一支足以箝制华北局势的大部队。日增兵数，据东京宣布为8400人，经实际调查确数为二万人。这支驻屯军的兵力，除了一个配有炮兵联队的旅团外，还包括航空大队、骑兵大队、机械化学兵大队、工兵中队及各地守备队、宪兵队等。此外，在华北十五个重要城市还设立了由便衣武装人员组成的特务机关部，并豢养了一大批伪军。这股力量足可随时发动进攻，攫取华北。在这种总的形势下，他们可以随时制造种种事